

■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参考丛书 ■

丛书主编：俞可平 王伟光 李慎明

NONGYE DE ZHENGZHI JINGJI FENXI

农业的 政治经济分析

主编：何增科 周 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 何增科, 周凡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参考丛书)

ISBN 978-7-5366-9307-4

I. 农… II. ①何…②周… III. 农业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分析 IV. F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9124 号

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NONGYE DE ZHENGZHI JINGJI FENXI

何增科 周 凡 主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杨亚平

责任校对: 周玉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俊棚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 mm 1/16 印张: 28.5 字数: 400 千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册

ISBN 978-7-5366-9307-4

定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参考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丛 书 主 编：俞可平 王伟光 李慎明
丛书编委会：俞可平 李慎明 王伟光 顾海良
 黄楠森 靳辉明 李崇富 徐崇温
 卫兴华 许征帆 庄福龄 夏伟东
 杨金海 王学东 何增科 钟哲明
 罗文东 梁言顺 杨雪冬
主 编：何增科 周 凡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参考丛书》总序

无论是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看,还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命题和现实主张,构成了人类思想的一个“磁场”,吸引了无数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自不必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也难以回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 19 世纪所提出的重要命题。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思想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还形成了一门所谓的“马克思学”。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纷纷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同流派。应当说,除了那些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粗暴的谩骂、攻击、指责之外,所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即使其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与我们迥然不同,也都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更加全面地认清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因而,编选一套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研究参考丛书,力求反映各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上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对于推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正是这样一套集国内外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研究方面若干代表性成果的资料性丛书。

从直接的目的来说,编选这套丛书,也是为了完成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规定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努力分清“四个哪些”,即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在编选时,我们遵循这样几个原则:

第一,紧密围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如民主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阶级问题等等。

第二,尽可能地选择在相关问题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哪怕它们不是当代的而是前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公开发表的成果。

第三,以编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为主,即《丛书》的主体将是国内外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原著。事实上,这套丛书是以中央理论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的相关研究主题来组织编选的,由各子课题的首席专家作为每卷的主编。我们充分尊重各位首席专家的意见,主要由各卷主编来确定选题的范围和具体的内容。

感谢各位首席专家和各子课题主要成员为编选这套丛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感谢重庆出版集团为顺利推出丛书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希望本丛书的出版不仅对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也有所贡献。

俞可平 2007年9月26日晚于方圆阁

第四部分

国家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国家的性质和政府在水产发展中的角色^①

贾斯特·法兰德 杰克·帕金森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 罗 骞

政府对农业现代化可能做出的贡献,受其力量、稳定性和可接受性的限制。政府的实力反映在确保法律和秩序的能力中,反映在强化政治和行政决定的能力中,也反映在支持经济生活的契约原则中,还反映在满足社会对政府提出的其他需求之中。政府的稳定性为公众活动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提供了基础,个人、市场和组织行为以此相互联系。这并不只是个别政府的任期问题,而且是国家的性质问题。比如说,在正常的民主条件下,连续性和可预测性很少受到政府不断更迭的影响。正是政治系统的总体性提供了政府功能的连续性。

政府的可接受性决定了政府能够做什么,政府的行为和声明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还决定了它的政策在多大范围内被接受和坚持。可接受性不能仅仅看成是只与民主政府相关的一个特征,历史上有大量事实证明,独裁主义政府,甚至法西斯政府都有很高的可接受性,因此具有广泛的影响,特别在农业方面有广泛影响。

我们的目的在于探索政府性质的特征,这些特征对于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地位具有影响。我们并不试图对不同性质的国家组织进行系统分析,比如说对封建主义的或者独裁主义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

① 原文出处: Just Faaland and Jack Parkinson,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and the Stat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47-274。——译者注

平民的或民主的国家等等进行分析,而是集中于密戴尔的柔性和刚性国家概念,这一特征忽略国家性质其他方面的不同点^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想在争论中引入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维度,这种争论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活动常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分析方法。经验表明,有关政府做出的各种决定,常常假定政府坚强有力并且能够彻底地、自动地遵循它的决定。当然,事实远非如此,在这种假定基础上做出的决定肯定是没有效率的,甚至更糟糕。然而,在争论和实际的政策制定中,这种错误却一再发生。而且,对在现实中根本用不到的选项进行毫不相关的比较,比如说,在一种完美运行的市场经济和完全得到控制的^②经济之间进行比较。考虑到实际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高度不完美性,这种“理想型”的比较至多具有学理上的,或者说教学方面的价值。一个理性的决定总是来源于对可供选择的事物、不完善系统和行动路线逐一的检查。了解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将使我们对一般化保持高度怀疑,比如说,逼迫大多数非洲国家对“市场的自由力量”更多地开放他们的经济,取消对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津贴和限制,或者实现其他的消除管制措施。政策分析者的任务主要不是对这种一般化做出简洁表述:只有在特定国家特定时间的特定环境中才能对选择方案做出真正的、有重要意义的评估。

下面,我们将讨论政府寻求干预农业发展的不同行动领域。这种干预的性质通常由国家本身的特征而定——也就是由政府保留中央权力的趋势,以及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它拥有权力的程度而定。我们将反思在整个发展中农业潜在的战略地位,特别是,我们将说明工业和农业增长之间的相关度,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这一讨论,将为我们最终分析政府的适当干预提供理论准备——不论这种干预是作为主办人的直接参与,还是创造技术、人力和引导性的制度基础以支持农业的发展。

^① “这些国家(南亚国家)都是‘柔性的国家’,不仅因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决定通常不是强迫的,而且因为,这些国家的权威,甚至是农业政策都不愿意给人们增加责任。”(密戴尔, 1968, p66;也见同一著作的第 18 章. 13 和 141 两部分。)

一、政府行动的基础和范围

不能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国家权力促成变革十分普遍有效。一般化是不大可靠的,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例外。试图对这些国家中国家性质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出普遍概括,总是让人感到踌躇,因为政府的形式和功能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国家之间本身也存在巨大不同。就我们谈论的问题而言,难道就不能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找到足够的相似性吗?克拉彭(1985)关于第三世界政治的研究为一般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础。在他看来,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也许还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些相同点:在诸多方面它们都共同置身于单一的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在全球政治秩序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全球经济秩序形成之前,亚洲、非洲和美洲政治结构多种多样,它们之间没有共同的特征可以用一个单一的范畴进行分析。欧洲殖民主义的重要性主要在于成为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形成的途径。”(p. 12)

在全球背景下,这一陈述也许是正确的。但是,殖民主义给政府体系带来的并不全是好处,它没能使政府体系不仅被认可,能够满足需求,而且能适应环境变化和政治压力,能够吸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社会力量和联盟。有力的、稳定的、被认可的政府在发展中国家为数甚少,即使在一定时间能够做到,它也易于被压力所击倒。在不同时期,所有这些国家几乎都是叛乱、革命和军事冲突泛滥之地,有时它们甚至会阻碍发展或者使发展倒退很多年,就像在苏丹和孟加拉我们的个人经历中所知道的那样^①。

二、政府的性质:中心权力

软弱无力的政权将产生严重后果,这些政权努力高度集权,却多年得不到组织化法理权威的支持,这种权威性需要其目标和手段广泛被

^① 关于发展中国家一直到1965年的冲突事件的说明,见Huntington(1968,p4)。

认可才能获得。后果之一表现为,统治精英集中起来以留住支持者、收买反对派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而很少考虑国家的客观需要。相对于具有优良民主传统,通过普遍认可的程序民选政府的发达社会而言,在这些国家中,为了获得拥护和舆论支持,总是更多避开坚强有力的领导。努力维持拥护的结果之一,便是政府更多具有世袭的特征,其权威主要来源于个人人格,而不是其职务。从部级人员的委任到公务员,以及具有特权和罢免权力的最低级官员都有这一特点。地方交际性的、可以接受的小费和敲诈可能导致贿赂勒索,以及绕开市场获取财富的特权。这种经济陷阱的影响十分深远。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财物控制体系被作为战时计划遗产采纳,而战时资源的运用是由国家决定的,人们不加反思地认为,这一控制体系对于发展而言同在战争中一样具有意义。当这一点被证明并非事实时,开始了慢慢撤除控制机构的过程:这一控制体系赋予了官员运用它的权力和机会,它在农业中的效果和在工业中完全一样。

在苏丹和埃及,由于担心毕业学生失业产生政治影响,尽管他们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贡献,还是被放到了政府的薪水册上,而那一方面的排水财力本来应该被直接运用于农业。与乌干达、中非共和国或者菲律宾等国家政权的敲诈勒索相比,这种资源的浪费也许还是比较小的。不过,这个实例说明,敲诈财物的影响具有普遍性。

这种舆论国家另一方面的后果是,政府对官员缺乏信任,国家的人民对政府缺乏信任。除非官员们的成就本身使他们丢脸,否则,要求官员们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就干扰了政权一致和维持权力所需要的支持和亲密关系。既然如此,官员们就很少被清算,错误也就不大可能得到纠正。而且,舆论本身会弱化个体和群体的责任^①。

为了掌权,任何层次进行的斗争都容易阻止作出决定,这些作决定的人不愿意步调一致。这种趋势在殖民地也有先例。在强有力的殖民机构中服务,并不利于采取主动态度,决定总是依据书本作出,还要浪

^① 更加广泛的讨论,见 Hyden (1988, pp. 20-22)。

费时间适当地去参考其他权威。在这样的环境中,几乎没有空间发挥主动性。

这些倾向由于政权维护权力的本性而得到了加强。这种趋势还反映在部长们愚蠢的行动之中,他们指望全能的总统领导,不敢越雷池半步^①。拖延总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妨碍了需要快速作出决定的经济活动。但其后果甚至更加的深远。准确地说,一个高度集权的政体并不喜欢授权,而是反对这样做。权力在猜忌中被维护。地方政府和权威机构被有力地控制和管辖,他们被剥夺了可替代性的收入,不得不听从总部的决定。即使一个政权其政治权力本身是安全的,它仍然可能不愿给地方政府提供收入,包括征税的权力。

其他方式也阻止授权。当权力集中时,公务员离开中心可能是很勉强的。当然,这种讨厌的事情被其他不利因素强化了,诸如商品房的缺乏、教育设施的缺乏,以及其他文化附属物的缺乏等等。这种状况对于农业而言十分重要,因为农业是一个高度非集中化的产业。能够监督并实现政府政策的、胜任的公职人员难以找到。在地方行政缺场的情况下,相互联系的各部之间很难调和,这种调和要在权力中心解决,而不是在政策将要发生冲突的现场,那样本来应该是高效率的。

虽然权力并不总是属于政府,公共行政能够提供更连续的导向。在孟加拉,政府及其各部换来换去,但公共行政却更加稳定,各得其所,真正的权力属于它们。公共行政获得机会提供导向,他们实现了殖民统治中更加有效的方面,尽管他们不大希望也不大可能表现出变化的更多主动性。虽然他们也受到政府体制的不确定和权力混乱的影响,但是,他们也能够维持一些服务传统,凭借自己的资历争得权力来保护自己^②。在农业发展实际方面,教训是明显的:在许多情况下公务员发挥着重要作用,政策决定和项目实施常常依靠他们。

① 关于决策集中在总统手中的后果的讨论,见 Hyden (1988, pp. 20 - 21)。

② 在行政事务中取得高的职位,通常决定于几年以前举行的一些入职考试中的表现。在那些高层人士中,这种表现回忆起来总令人十分满意,在论资排辈的秩序中,存在着与他们的职位密切相关的学问。当然,根据过去的表现和已经确立了的优先地位来提升官员,缺点十分明显。但是,这一体系也有它的优势。

三、促进发展的国家权力

当然,上面描述的这些情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具体环境。但是,几乎没有例外,发展中的国家政府总是组织得不好,支持农业发展的能力有限。来自于赞助者的关于管理失败的许多抱怨、缓慢的决策,以及不完善的经济政策常常根源于政府体系。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政府体系是为了取代过去(当然,虽然不是全部)由外国政权影响形成的政府而成长起来的,它们不能使自己适应快速发展需要。可是,改变政治体系又不在外来者委托托管的权限范围之内,他们必须认清这一事实并且适应它。通常不是政府的程序不可操作,而是要尽可能地认识政府程序的缺陷,设计出合适的运行方式,不能对这一体系的期望过高。

必须容忍一些发达国家官员对于运行不畅的政府体系其他方面的抱怨。有些抱怨是没有用的,比如说,抱怨整个政府机器因为腐败而百孔千疮,抱怨办理事务和获准许可总是要打折扣。通常情况下,机构里的人待遇太差,只有在发现收入之外有油水可捞的时候,他们才继续发挥作用。普遍认为,贿赂是办好事情的一种手段,虽然在西方人眼中是应受责备的,经济学家也把它看成是一种不适当的资源利用方式^①。

在一种更广阔的背景中,不能假定那些掌权者会接受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正确的政策。作为希望继续掌权和实现政治目的的一部分,提高经济效益的需求必须结合其他事项来考量。说服力主要在于政治的得失,而不是考虑技术效率。国家的统治者认为,如果不采取有利于技术效率的政策明显要付出失去支持和资源的代价,这种政策才可能被接受;相反则不然^②。

并非只有亚洲国家才适合于密戴尔的柔性国家分类。刚性国家较少,应该更多根据其政策效率来判定它们,而不是根据它们准备作出不

① 就像 Huntington (1968, p69)写的那样:“在经济增长方面,比一个强硬的、过分集权而又不诚实的官僚机构社会更糟糕的是一个强硬的、过分集权而又诚实的官僚社会。”

② 关于政策变化的后果(常常是不可预料的)的讨论见 Thomas 和 Grindle (1990)。

受欢迎的决定并付诸实践来判定。莫桑比克曾经是一个刚性国家,试图推进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政策,它差点被政治动荡所击垮。坦桑尼亚也曾倾向于刚性国家,但发现刚性并不总是合算有利。所有的政策都应该是根据达到目标这一意图制定的。但是,与政策相关的目标必须切实可行,这些政策能够付诸实践,并且得到受其影响的人们的接受。

虽然同20世纪60年代的看法相比,人们更少信任政府具有促进发展的力量,但人们几乎都相信国家起到一定作用,这种作用不止是建立公正、法律和秩序。然而,当计划处在全盛时期的时候,人们盲目地认为政府具有提出并且实施详细经济计划的能力。而经验证明并非如此。第三世界的政府能够并且也作出了计划,虽然他们大多数需要外国专家的服务才能做到,但这仅仅是开始。计划的实施常常出现相当多的困难,部分是因为行政能力有限,有时是因为计划本身不周全,在其他情况下,则是因为变化的经济环境证明了计划的基本假定是站不住脚的^①。执行涉及到私人经济部门时特别困难。要在计划者的指令经济和具有独立传统的、有效的私人企业之间进行调和是困难的,不能简单地将私营部门的计划和压制性的控制等而视之。私人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是敌视计划的,虽然通过提供基础实施和建立支持性的制度,计划有可能对它见解有利。既然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属于私营部门,明显存在大量自主经营的农民,当前计划经济的表现十分糟糕,计划失去宠爱就毫不令人惊讶了。

作出决定不依赖中央计划,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农业发展中无事可做。比如说,它可能试图通过建立国家农场来进行直接参与。当然,如我们即将解释的那样,我们认为这种动机不明智。真正需要的是在主要依靠个体私利来完成农业转型的同时,有限地、小心地选择措施来帮助农民。国家的作用在于创造农业繁荣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制止有损农业的行为,包括严重扭曲的激励机制。

^① 孟加拉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一个过时计划的例子,甚至在它开始执行的时候它就过时了。油价的上涨以及其他进口物资价格的高昂,使计划中关于能够支付的进口总量的估计失效了。

制定支持农业的政策常常伴随尝试和过失。换句话说,就是从错误中学习。所以,管理者可能会畏手畏脚。然而,如果人们认为提高农业产出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那就必须仔细考虑需要采取的手段,仔细考虑有机会被接受并获得成功的措施。政府支持农业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政策的制定者必须在他们所倡导的东西中进行选择。需要确定关键的参与领域,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键领域存在很大差异,虽然越来越多地运用现代技术是一个关键因素。在一些情况下,运用新的技术,政府在一个关键领域行动就足以提高生产力。提供灌溉设施,成倍地提高收成,即使还需要补充性投入,也足以促成农民方面的适当回应。在其他情况下,为了取得协作的全部效果,当采纳新技术需要一些条件的时候,政府更多的卷入是必须的。

四、政府在农业部门的地位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更集中考虑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干预的性质也需要考虑,对于这些最不发达的国家来说,问题的本质在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的产出太低,增长的速度太慢,不足以支持更快的发展。结果是就业机会不能按需要的规模增加,投资受阻,消费受损。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减少饥饿,确保穷人有办法获得足够的食物^①。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产量比提高工业生产要困难。只要看看最穷国家1965—1980年的记录资料就可以发现,农业产出平均增长还不到工业的一半^②。1980—1986年,二者的增长率更接近一些,但那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农业产量达到了很高记录,这使得整体的平均农业产量更接近工业。值得注意的是,在个别国家,农业增长速度和工业产出几乎一样;或者说,这种关系正好相反(即是说农业反而比工业增长快),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并不是农业

① 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见 Timmer, Falcon 和 Pearson (1983)。

② 关于这些数据的详细情况见世界银行(1988, p224)。

的成功而是其工业的失败。从长远来看,因为恩格斯定律的作用,不可能期望农业的增长和工业同步,当然,同样正确的是,在多数情况下,即使从很薄弱的基础出发,在发展的起始阶段,工业产出也可能表现出很高的增长。不过,在早期发展阶段,令人满意的对农业产品需求的增长速度,应该同能够取得的消费增长速度一样。

妨碍农业产出增长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通常是不令人满意的,即使不是如此,还是得克服其他许多障碍。工业生产大多集中在比较密集的地区,相对易于达到。在原始的农业中,大多数耕种是粗放式的,而且许多耕种地区十分偏远,比如说,在老挝山区和印度的西部。即使有的地区并不分散,但因为缺乏交通设施也难以达到。

另一个问题就是控制问题。在工业中,生产操作的控制通常集中在工厂内部,简单地说,就是依靠一般标准和专家之手进行控制,工人并不需要熟悉工业组织的生产程序和系统,就能进行生产。只要不是在最简单的意义上说,他们就不是管理者。只有在大的公司中,他们才能获得技术知识和管理方面的学问。他们通常得到跨国公司资源的支持,并且可以吁请公司总部的帮助。一个发展中国家,通常设想准备请求国外的帮助,获得立即可以使用的设备,也许它们的运行比发达国家的效率要低,有时甚至带来消极的意义,但毕竟能发挥作用和进行生产^①。

在农业中,现成的创新不能以这种方式实现。邀请国外的大公司建立大农场,即使它们能够有效地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如果没有社会的分裂,现存的农业协议就不容易被扰乱。很快地转移现代技术及其需要的配套输入是困难的。虽然没有把握达到,实际也达不到现代企业改变工业的那种程度,但要是没有这样那样的障碍,大量增加农业产出是完全可能的。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战后早期,一些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努力改变农业产出,一般都称之为“花生计划”,

^① 见 Balassa 及其合作者(1971,p239)。在巴基斯坦带来消极意义的实例包括制糖、食用油工业以及摩托车生产线。

它表明了在没有正确调查的环境中突然启动大规模农业行动的缺点。

五、政府作为企业家

政府能够作为企业家行动,采取的最直接方式就是建立国家农场,但这样做与考虑经济效率没有多少关系。根据一系列的政治决定,苏联建立的国家农场首先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言而喻,如果资本主义能够发展农业,它到处都落后于工业,那么,资本主义就能够提高民众的生活标准。……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做到了这些,它将不是资本主义:因为不平衡发展和大众的半饥饿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基本的、不可避免的条件,是形成这种生产方式的前提^①。

对俄国人民来说,最后的社会经济后果是,大多数西方世界的农业经济学家反对国家农场作为农业生产的手段。反对它们的论据一般在于官员不适应直接的商业运作。政府官员不实际,他们不关心利润,他们的训练、态度和注意力都不利于管理企业等等。农业工作也没有带给他们远距离控制的系统。有效的农场管理和劳动监管需要操作适时,需要对动植物的田间管理,维持土壤肥力,对价格和技术变化还要反映敏感。

对农业工作的要求缺乏理解,不知道如何组织它们,是俄国试图迅速转向国家农场这一努力失败的原因之一。这里存在一个盲目的假设——只要是命令就能够实现。投入 2.5 万名城市活动家作为监管人员、农场主席,或者政治官员就有利于改进农业实践和农业活动,这种想法是滑稽可笑的。“他们对农村问题无知,对农民智力的误解导致了那个时期的过度行为。”(洛维,1988,P. 181)对农民或者其他生产者理解上的失败,是至关重要的。在国家以无报酬的价格获得供给品以确保供应的努力中,这种缺点很早就显而易见了^②。保留粮食比以无利可赚的价格卖掉它更好;杀掉牲畜把它们用盐腌制起来,比让它们落到国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p. 59,转引自格里芬,1979,P. 179。

② 农业价格影响生产和消费,关于其地位和重要性的讨论见 Timmer, Falcon 和 Pearson (1983)。